

## 文化的研究取徑

研究者曾採取何種取徑來研究文化產業呢？本書主要檢視何種研究傳統，能最有效地闡述本書的主旨——解釋並評估一九七〇年代末以來文化產業變遷/延續的型態。本章希望可以找出：那些能夠說明緒論第二節「文化產業為何如此重要？」中所述基本議題的研究取徑。我們必須考量到文化產業作為文本創造者、創意作品的管理行銷系統、以及促進變遷的代理者等角色，發掘出審慎的研究取徑。一開始，我會先說明對此類文化分析有著重大貢獻的兩個研究傳統，但實際上，這兩個研究傳統卻缺乏對權力議題的關注，因此有所缺憾。

### 壹、文化經濟學

文化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專門探究文化和藝術。經濟學於十九世紀發展成為現代形式後，新古典主義的概念便支配了經濟學的研究假設及目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既不關注人類的需求與權利，也不介入社會正義的問題；它的焦點是在探討人類欲望如何才能有效地獲得滿足。雖然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用字遣詞與程序相當專業且艱澀，但它有助我們瞭解

市場如何及在何種條件下會有最佳的運作狀況，仍不失為一門實用的社會科學。它認為人類的福利就等於人們極大化其滿足的能力，並提供計算滿足如何極大化的方法，可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根植於功利主義，也就是一種追求幸福極大化的哲學（參見 Mosco, 1995: 47-8）。根據本書緒論的概述，我們關切文化產業產品對大眾及其日常生活的影響，但有關道德正義之類的問題，卻多半擱置不理。許多文化經濟學者承襲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他們認為人類幸福就等於經濟上的滿足，但在進一步評估文化產業時，這個假設卻有過於薄弱之嫌。此外，由其他文化經濟學的文獻可知，文化經濟學並不能釐清本書之研究目的。大部分文獻〔例如桃斯(Towse, 1997)所編入的多數文章〕並未注意到我們慣於消費的文化產業，反而把焦點放在周邊的文化產業。此領域的首要論辯就是：表演藝術(以電影為主)是否會因為勞動成本提高而註定面臨窘境(Baumol and Bowen, 1966)？有關藝術市場的文獻數量浩繁，這些都是有關人類生活的重要面向，經濟學家在瞭解市場時，實在不應該有所闕漏。雖然如此，但主流文化經濟學忽視流行音樂及電視等重要文化產業，卻是很顯著的現象<sup>A</sup>

然而近年來許多跡象顯示，主流經濟學對文化問題有更具彈性的研究途徑出現，對核心文化產業的重視亦與日俱增。其實，新古典主義的傳統從未完全支配主流經濟學：舉例來說，制度經濟學便提供一個社會學式的取徑來研究組織權力。甚且，即使在新古典主義概念仍然盛行的時期，這個典範的某些假設也逐漸遭到質疑。比方說，這些脫離歷史及社會的概念運用很少不被批判(參見 Fine, 1999)。近來有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研究，試著解釋文化產製與消費中不平等及不斷循環的問題

---

<sup>A</sup> 多年來關於廣播事業的討論，只限於探討是否應該將其視為公共財，而給予補助津貼的議題(參見 Peacock Report, 1986)。

(Caves, 2000)，並意圖影響公共文化政策。一些來自其他領域的論辯逐漸地影響文化經濟學：例如，以政治經濟學取徑來探討美國支配國際文化產業的現象(Hoskins et al., 1997)，及有關文化產業的集中化與集團化等特定問題(Congdon et al., 1995)。我稍後將在本書繼續探討這些論述。毫無疑問地，主流文化經濟學的研究限制顯而易見，它並不能闡述我在本書中想關切的權力議題。尤其主流經濟學還全然不重視經濟組織間的關係與文本意義的議題。正如我們下面即將看到的，這個關係是研究經濟與文化的另一取徑中心，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政治經濟學。

## 貳、自由多元主義的傳播研究

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研究者開始運用社會學的方法來探究大眾傳播媒體。美國的傳播研究傳統則建立於一九五〇年代。這個主題持續延燒至今，甚至擴及歐洲及其他各地。許多年來，這個領域的主要關切重點在於媒介訊息對閱聽人的「效果」，並傾向認為效果是有限的，且難以證明此效果的存在(Lowery and DeFleur, 1995)。這個傳統深受行為主義所影響，相信觀察個體的外在行為才是瞭解社會的最佳方法，而不是透過理解心智的過程與事件(經由心理學或哲學)，亦非探究社會權力與地位的議題(經由社會學)。不但如此，它們探討文化產製與組織時，甚至會摒棄有關訊息消費的分析。

然而，近來許多自由多元主義的傳播研究，越來越關注與文化產製有關的權力及社會正義之議題，這也是本書的基本重點所在。此研究傳統會審視媒介改變政治傳播的影響力，通常還會特別強調：民主過程逐漸仰賴廣電媒體及平面媒體來加以運作，這種現象對社會來說是相當危險的。舉例而言，布魯勒

與葛瑞威奇(Blumler and Gurevitch, 1995)便曾發表令人信服的「公民傳播危機」論述，認為若大多數人是藉由電視來獲取關於政治的知識，那麼想維持社會中的參與性公民權便非易事。而此研究傳統的其他學者，則試圖發展出規範性的模式，以評估大眾媒體增進或危害民主發展的程度(例如 McQuail, 1992)。

- 30 另外，歐洲媒介研究團體(例如 Euromedia Research Group, 1997; McQuail and Siune, 1998)、以及其獨立合作研究者〔如湯斯托(Jeremy Tunstall)，本書引述許多他的論點〕，也提供了有關文化政策及文化產業組織變遷的重要資訊。從這些傳播研究及社會學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多元主義的政治性觀點是在探討文化產業如何影響民主過程及大眾生活。

除了這些優點外，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傳統也確實有所侷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能系統化說明文化產業如何與更廣泛的經濟、政治及社會文化過程相互連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由多元主義本是一種政治形式的問題：這種觀點對權力及不平等的結構形式輕描淡寫，樂觀而含蓄地認為社會有如遊樂場一般，不同的利益團體在此為各自的利益相互競爭。

其次，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傾向把文化與社會的關係視為正式的民主程序。資訊絕對是重點所在：這個概念認為，應該提供工具給參與公眾事務的公民來做出理性決策，使民主機制得以適當運作。可見關於公民權及民主程序的資訊確實相當重要。但是我們身處在娛樂事業充斥的社會。實在不應該忽視娛樂所帶來的愉悅，認為這是脫離「真實」政治的事物。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充斥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娛樂，不僅影響我們對於民主如何運作的看法，也改變我們看待人類生活其他面向的觀感，包括我們自己的個人內在感覺與情緒等。稍後我將在本章討論特定的文化與媒介理論流派(特別是針對文化研究取徑加以闡述)，指出思考上述議題的正確方向。但整體而言，自由多元主義的傳播研究，對如此的創新思考其實頗不以為然。

## 參、政治經濟學取徑

相較於文化經濟學及自由多元主義的傳播研究，政治經濟學取徑更能分析與文化產製有關的權力。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分析整體傳統的統稱，它與主流經濟學大異其趣，比較強調倫理及規範性的問題。這個用語不只被批評主流經濟學不擅處理權力衝突問題的政治左派份子所採納，就連極端的保守傳統亦使用此詞彙。於是有些學者改採批判性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31，使他們的觀點能與保守古典理論家〔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及其二十世紀的承繼者〕的著作有所區別。B

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社會學者及政治學家發展出以批判性政治經濟學為取徑的文化研究(或稱媒介、傳播研究，這些用語經常被任意拿來指涉此研究傳統)，他們注意到私人企業在文化產製中逐漸嶄露頭角。文化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取徑常被誤解、簡化或遺漏。因為此取徑對媒體及文化企業，甚至其政府聯盟皆大加撻伐，也難怪許多媒體機構對它憎惡不已。更令人驚訝的是，其他各界對政治左派及政治經濟學亦充滿敵意。

常有人誤解政治經濟學取徑是正統文化經濟學的一個形式。但實際上，政治經濟學挑戰並指陳新古典主義典範缺乏倫理觀點。高定與莫達克(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2000: 72-3)認為，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取徑與主流經濟學有以下四點不同：

### 1. 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取徑以全觀的(holistic)方式來研究媒

---

B 參見莫斯科(Mosco, 1995: 22-69)的著作。其內容詳盡而廣博地分析整體政治經濟學取徑，可供我們瞭解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背景知識。

體，認為經濟與政治、社會及文化生活相互關連，而非一個獨立的領域。

2. 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取徑以歷史性的角度，密切注意國家、企業與媒體等角色在文化中的長期變遷。
3. 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取徑「中心主旨是關切私人企業與公共干預之間的平衡」(Golding and Murdock, 2000: 73)。
4. 最後，「或可說是最重要的」，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取徑不但超越「效率等技術議題，更致力於正義、公平及公共良善等基本道德問題」(Golding and Murdock, 2000: 73)。

這些特徵不但界定了政治經濟學取徑，也確實釐清了它與文化經濟學之間的不同，不過以下兩個特徵，更有助於瞭解此研究領域的特殊之處。

1. 批判性政治經濟學取徑指出一個事實：文化在資本主義體系下被生產及被消費，此取徑的基本議題在於解釋權力、名望及利益的不平等。你不需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只要透過政治經濟學論述，就可以釐清資本主義及其負面效應。
2. 從政治經濟學取徑來探討文化產業的研究，其中一大貢獻便是將文化產業為權貴利益而服務的程度此議題，納入學術的論辯範圍。因此，政治經濟學取徑的中心主旨即在探討文化產業的控制及所有權(參見第二章及第五章)。權貴階級掌握文化產業的所有權，並透過對文化產業組織的控制，是否終將導致文本的流通，必須滿足這些擁有權貴的企業主及其政商盟友呢？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論辯，以致於有些學者、老師及學生都把政治經濟學取徑，誤認為文化產業組織乃是為其企業主利益服務這樣的觀點。但是事實上，就連許多政治經濟學家

想要精準地說明這個議題，也皆會面臨到困難及錯綜複雜的處境。

## 肆、何種政治經濟學？

本書緒論早已指出，政治經濟學取徑主要是在探討與文化有關的倫理與政治議題，這對此類研究具有重大的貢獻。然而，與其他研究相比，某些形式的文化政治經濟學，能提供更多的觀點，以瞭解造成文化產業變遷與延續的因素究竟為何。因此，實在應該更審慎地闡釋政治經濟學。這也有助我們面對有關這個用語的一些簡化與誤解。

文化政治經濟學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常認為此領域是單一而統合的取徑。莫斯科(Vincent Mosco, 1995: 82-134)曾分析北美、歐洲，以及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他針對這三種地理政治情境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政治經濟思想，提出詳盡的剖析。我將於第六章再處理有關第三世界文化依賴與媒介帝國主義的重要論述。但此處我想先依據莫斯科的分類概念：探究北美及歐洲兩大政治經濟學取徑支派間的緊張關係。

1. 想瞭解北美政治經濟思想傳統，可參考許勒(Herbert Schiller)、杭士基(Noam Chomsky)、何曼(Edward Herman)、與麥克柴士尼(Robert McChesney)等人的作品。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Schiller-McChesney tradition)，特別針對文化產業權力與財富的成長軌跡，及文化產業與其政商盟友間的連結關係，加以記錄並分類。 33
2. 文化產業取徑(cultural industries approach)則由歐洲的米亞基(Bernard Miege, 1989)與葛爾漢(Nicholas Garnham, 1990)開創，其後由歐洲或其他地區的學者承繼(Straw,

1990; Ryan, 1992; Aksoy and Robins, 1992; Driver and Gillespie, 1993; Toynbee, 2000) C

我曾在本書緒論中提及米亞基的著作，相對於阿多諾及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他倡籲使用複數型態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由這個例子可知，此取徑考量到文化研究複雜、爭議而且矛盾的特質 D 我之所以大力讚揚米亞基的著作，是因為我認為文化產業取徑比起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更能評估與解釋文化產業的變遷/延續。在我看來，文化產業取徑較能處理以下幾個問題：

### 一、矛盾

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強調權力的策略性運用。毫無疑問地，商業策略性地操作權力極為普遍，若認為許勒或其他等人的研究取徑是「陰謀論」的話，實在有失公允(整體來說，有時政治經濟學取徑會被貼上這種陰謀論的標籤)。但若強調調和一致的策略面向，那麼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確實低估系統內的矛盾。至於文化產業取徑，則強調文化商品化過程中的問題與矛盾，將文化產製的面貌精準地呈現出來。並且認為商業化或工業化的文化產製過程之中存在著矛盾。而不像許勒－麥

---

C 此分類仍遺漏了許多批判性政治經濟學著作的重要貢獻，如柯倫(James Curran)、高定(Peter Golding)、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莫斯科(Vincent Mosco)及莫達克(Graham Murdock)等人。這些學者的著作探究特殊的議題，對文化產業取徑的建樹頗多。

D 某些教授及學生認為，阿多諾(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及其法蘭克福學派學者的文化悲觀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是相同的，兩者可相互界定彼此。但我們可以從本書緒論發現，米亞基(Miège)曾對阿多諾與霍克海默之論述加以評判，提出其特殊見解。就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而言，法蘭克福學派在理論上的關注，似乎是與其大相逕庭。



克柴士尼傳統所假設的，企業與非營利的「另類」製作者之間是簡單而兩極化的關係。

## 二、文化產業的特殊環境

34

文化產業途徑之所以較擅於處理矛盾問題，是由於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優點：文化產業取徑不但能以巨觀層次來探討總體經濟與文化產業間的關係（這是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的一大重要關鍵），還結合了工業化文化產製與其他種類的工業生產間有何差異的分析（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就無法達成這點）。本書緒論亦曾提及，透過文化產業取徑，我們便能審視文化產業特殊環境所造成的困境。

## 三、產製與消費之間的緊張關係

雖然顧名思義，文化產業取徑將焦點放在供應層面上，也就是文化產製、流通以及其社會政治脈絡，但實際上，此取徑並未忽視閱聽人的活動，而這通常是政治經濟學取徑及某些媒介社會學的中心目標。相反地，文化產業取徑認為文化產製的商業環境之所以矛盾、模糊及相互競爭，大部分是因為閱聽人面對文化文本的本質所產生的問題。產製與消費不應被視為相互分離的實體，應該看成是單一過程的不同時刻。在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中，多少忽視了產製與消費之間的連結與緊張關係。

## 四、符號創作者

依我個人之見，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對集中化、集團化及整合等過程的分類整理極為重要。但是許勒、麥克柴士尼及其他學者，對市場結構如何影響文化產製組織，及一般日常層

次中文本製作的議題，卻很少著墨。文化產業取徑則將這些幾乎被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完全忽視的符號創作者(負責把創意注入文本內的人員，如作家、導演、製作人、表演者等)納入研討範圍，強調這些文化工作者所面臨的環境是上述過程的結果。E 文化產業取徑對這個重要議題的關注，使此取徑較能評斷文化產製的組織，究竟是否依據社會公平原則來進行(參見第二章)。

### 35 五、資訊與娛樂

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與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相同，主要關切的是資訊媒體。文化產業取徑則能更成功地處理難以同時闡述的資訊與娛樂兩種議題。

### 六、文化產製社會關係的歷史變遷

最後，兩種取徑都十分重視歷史(McChesney, 1993)，但相較於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文化產業取徑通常對文化產製消費之社會關係的歷史變遷更為敏感，此取徑的某些學者其實是承繼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歷史社會學而來(參見第二章)。

## 伍、文化社會學：文化觀點的產製

根據上述論點及本書緒論，應已闡明為何我認為批判性政

---

E 米亞基(Miège, 1989)、葛爾漢(Garnham, 1990)、萊恩(Ryan, 1992)多年來始終特別地關切此議題。直到最近，一些文化研究學者如麥克蘿比(McRobbie, 1998)及羅斯(Ross, 1998)，亦開始探討這類問題。

治經濟學取徑對於研究文化很有助益，尤其文化產業取徑更是深得我心。文化產業取徑比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更重視文化產製的組織動態，但即使如此，文化產業取徑仍然缺乏對文化產業組織的實證關注。

文化社會學的特殊論述傳統，主要是以美國為發源地，採納韋伯式及互動論者的分析傳統，也就是所謂的「文化產製」觀點，因此在這個領域有著重要的貢獻。其中最有價值的一個貢獻，便是此觀點增長了我們對創意的概念。文化常被理解成具有天賦者的作品，但相反地，某些學者如貝克(Howard Becker, 1982)及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 1976)，卻提出不同見解來幫助我們釐清，創意的文化藝術作品其實是透過合作及複雜勞動分工的成果。

在此特別有用的文獻是彼得森及柏格(Peterson and Berger, 1971)、赫許(Hirsch, 1990/1972)及迪馬喬(DiMaggio, 1977)的論述，他們皆詳盡地說明了文化產業的特徵。這些論述與文化產業取徑，對文本產製企業之特殊策略的看法頗為一致。舉例來說，我在本書緒論曾經概述的文化產業特徵，就是受到赫許的論述所啟發。

美國社會學家的論述，不但與上述法國文化產業學者的發展十分相似，亦相當具有開創性，但這只是因為他們以綜合而易於理解的觀點，審視文化的產製消費如何適應更廣泛的經濟、政治及社會脈絡，也就是分析文化產製在特殊環境下如何獲取收益。美國組織社會學家認為文化產業是獨立的系統，與政治或社會文化中的衝突沒有關連，權力與支配的議題並非他們的研究重點。而創意工作者的處境，除了比其他產業工作者擁有更多自主權此一已被承認的事實外，幾乎都被遺忘了。很少人會去注意到剽竊、黑箱作業、跨國娛樂企業摩天大樓與年輕藝術家音樂家阮囊羞澀的落差等種種問題。以傳播研究的面向來看，我認為這些問題是由於這些學者的論述中，隱含著自

由多元主義的政治觀點所致。無疑地，這是因為民主化的衝擊使然。他們的目標在於去除創意的神秘力量，試圖瞭解並質疑品味與價值的階層。有些學者，尤以貝克為甚，特別強調人們在日常生活面向所擁有的豐富資源，而這個觀點則與人們無力面對大型文化產業企業的簡單假設大異其趣。文化產製觀點似乎很少關切企業機構的存在及其造成的後果。因此，「文化產製」社會學家原本關注的法律、技術、市場及組織等各要素，究竟效力於誰的利益之問題，已被邊緣化。如果不進一步分析，就不可能妥善解答這個問題。更何況，「文化產製」社會學家似乎並不熱中於這些問題，甚至連對提出這樣的問題都興趣缺缺！

## 陸、基進媒介社會學/媒介研究

我們在基進媒介社會學及媒介研究中，可以發現更能完整闡釋權力議題的文化產業組織實證研究。我這裡所謂的「基進」，是因為此取徑認為，邪惡的權力類型及不平等其實根植於當代社會的特有結構當中；而不像在自由多元主義的觀點中，這些都被當成是可以矯正的瑕疵。從一九七〇年代初開始，美國的基進媒介社會學及歐洲的媒介研究新興學科，為當代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個補充的研究取徑，二者的發展自一九七〇年代初便常被相提比較。這些來自美國的重要論述有些源於韋伯式社會學傳統，它們關切新聞節目如何服膺新聞機構的命令，而不直接報導真實(例如 Tuchman, 1978; Gans, 1979)。根據這個觀點，新聞從業人員雖可獨立為其雇主工作，但他們的工作終究是受官僚科層組織與慣例所侷限。這些慣例最終還是會產製出不能精準描繪現存權力關係的文本。有些重要的英國新聞研究亦呼應以上論述的要旨(例如 Schlesinger, 1978)。有關娛樂事業的研究雖較少見，但仍精闢地洞悉文化產業的動態。

例如吉特林(Todd Gitlin, 1983)在其《透視黃金時段》(Inside Prime Time)一書中,透過訪談電視公司主管及重建媒介組織的歷史,挖掘出商業力量究竟如何驅使新聞網逐漸偏向保守。

這類研究因為與有關文化的批判性政治經濟學並行不悖,因此二者常被相互混淆。但是,批判性政治經濟學試圖全盤瞭解當代資本主義中文化產製的情形,因此很少出現專研文化的政治經濟學、或以文化產業組織的實證研究作為研究主題的學者。而基進媒介社會學最大的長處,在於它將意義及文化產業組織產製的文本種類等兩個議題,與文化產業的權力動態相互連結。

## 柒、意義的問題：思考文本

截至目前為止,我已經說明了哪種文化產業取徑,最適合處理與文化產業組織有關的權力問題。但這些不同的取徑如何探討意義的問題?大部分的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都缺乏一種文本的觀點。此傳統中有一分支是運用量化的內容分析法,來審視文化的成果,它的目標是欲提出一個可供檢驗而客觀的意義測量方式。正如費斯克(John Fiske, 1990: 137)指出,「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效的檢驗,檢視我們平常是否運用較主觀、較具選擇性的方式來接收訊息」。但自由多元主義傳統在內容面的概念上,則是重視訊息的效果研究。我們需要探討更複雜的意義觀點,也就是所謂文本多義(polysemy)的概念,這表示文本可以依據(有限的)各種方式來加以詮釋。這也意味著形式及內容(實際上,二者總是相互影響,從未獨立存在)都是我們必須考量的問題。

普遍來說,雖然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對於文本作為「內容」或「訊息」的瞭解相當有限;而文化產製觀點,至少到目前為止(參見 Peterson, 1997),仍時常選擇去忽視文本意義的議

題。舉例來說，彼得森(Richard A. Peterson)指出，文化產製觀點坦承其取徑並不在意文化產品的形式與內容，不過，他認為此取徑著重文化產製面向，因此可彌補這項缺憾(Peterson, 1976: 10)。根據上述觀點可知，產製研究並不能影響文本研究，二者是兩個獨立自主的分析領域。如果我在緒論中的論述正確，那麼文化產業的挑戰便是去透視這些關係，而不應忽視它們。例如，我們應該以歷史變遷的角度，來思考文化的產製消費與文本變遷的關係。

研究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學者，對文本的分析及意義的關注，更是付之闕如。米亞基(Miege)的著作幾乎沒提到文本意義的問題。葛爾漢在《資本主義與傳播》(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一書中，更發表許多短文，抨擊媒介研究有「賦予文本特權」的傾向，並「過於重視再現及意識型態的問題」(Garnham, 1990: 1) ƒ 高定與莫達克則宣稱，「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具體活動，可以分析意義是如何被生產及再製的——這對我們在此所秉持的觀點來說是十分重要的」(Golding and Murdock, 2000: 74)，不過，這句話也揭露他倆並未涉足這類研究的事實。至於許勒－麥克柴士尼傳統的基本假設，則認為文化產業所產製的多數文本都很保守，並受慣例所侷限。不過他們並未整理出系統化的資料來加以證實，因此理所當然地，這些假設很少受到公開發表。

## 捌、文化研究取徑

另一方面，不論在智識面或政治面上，都與前述討論之各

---

ƒ與葛爾漢在一九八 及一九九 年代的論述相比，他自己在《解放、媒體與現代性》(*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Garnham, 2000)一書中，對文本與符號形式的研究變得更加詳盡。

取徑大相逕庭的，大概就是文化研究了。雖然此研究領域仍有許多分歧與斷裂之處，但它的核心都試圖藉由審視文化與社會權力的關係，來檢驗並重新思考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取徑多半對這個跨科際領域持有明顯的敵意。而相對地，某些文化研究學者也對上述取徑，如政治經濟學和基進媒介社會學等，抱持著極端負面的觀感。然而，文化研究取徑卻對我們在瞭解意義與文化價值時大有助益，甚可彌補許多研究取徑的缺憾。那麼就這個方面來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究竟是什麼呢？

首先，文化研究深信必須認真地看待平凡而日常的文化。 39  
這表示我們更能以人文社會科學等學門的既定規則，把文化的階層問題納入公共論述範圍當中。文化研究反對過度重視神聖的「高級文化」(high culture)文本，但這不必然等於他們「頌揚」(celebrate)大眾文化，而不加以批判。此途徑堅稱人們需要廣泛思考文化中各種不同要素彼此間的關係，而不應事先決定哪些部分需要分析、哪些則可以捨棄。這個廣義的文化概念亦具有國際面向。文化研究於一九八〇及一九九〇年代逐漸走向國際化，出身歐美全球核心地區之外的學者，包括離散各地的知識份子如薩伊德(Edward Said, 1994)及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 1998)等人，為我們開啟一個思考文化的空間，認為文化是殖民主義下的複雜產物。正因如此，我們常在政治經濟學與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論述中，發現輕視大眾文化及非西方文化的現象，而文化研究取徑的最大貢獻便是對此點加以改善，深入審慎地探討其他文化論述傳統所描繪的各種文化經驗。另外，人類學及社會學取徑(包括文化實證社會學)亦有這類民主化的概念，但文化研究對象徵性權力問題的探討仍較為深入。

---

③ 雖然此領域偶爾仍有一些學者陷入「未經批判的文化民粹主義」(McGuigan, 1992)的傾向。

其次，至於文化這個我們所謂的艱澀用語，文化研究則能相當精準地區別它的定義。特別的是，他們認為文化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影響力及衝突在其中交會結合。倘若有人認為文化是有限不變的特殊場域，且/或人們「共享單一的文化」(Hall, 1994: 323)，必然會遭到他們大肆抨擊。同樣地，這些重要論述亦來自早期歐美殖民地的移民學者，他們大多並非出身於歐美都會中心。文化研究還可改善傳統取徑的遺珠之憾。文化研究對文化概念的瞭解相當充分，因此能深入探討文本內的政治意涵。而觀點近似的政治經濟學者、基進媒介社會學者及媒介研究者，都關切文化產業的文本究竟為誰的利益服務。但文化研究學者則把利益概念加以擴展，超脫政治經濟的利益層次，強烈地納入認知與認同的政治問題。如此一來，便能指出這些看似純真的文本，是如何地(進一步)排斥並邊緣化相對弱勢者了。

第三，文化研究提出關於「誰發聲？」的核心政治問題，探討誰擁有宣稱及解釋文化的權威。重要的是，就如同擁護這些結構的人，這些問題亦被批判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異性戀主義、白人優越感及帝國主義等的人士所援引。文化研究論述的最大貢獻，便在於發掘文化中持續而根深蒂固的權威。例如，參與文化研究的人類學者會參考傳統民族誌學者的客觀概念，後者會以相對特權的角度，觀察「原始」人類的土著原生文化(參見 Clifford, 1998)。就某些方面而言，這正好呼應了近三十年來社會思想中實證主義與客觀主義的「詮釋轉向」。至於文化研究的缺憾，就是此取徑有著天真的建構主義傾向，並質疑任何人評論社會弱勢族群的權利。不過，近來新興研究如黑人研究、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及女性研究等，不但將新觀點帶入文化研究之中，亦探討從某特定主觀角度(例如接受私立學校高等教育的白種男性)的政治觀點，是如何看待他者文化實踐的嚴肅問題。



第四，文化研究還率先論及與文化相關的文本性、主體性、認同、論述及愉悅等議題。此取徑有助我們瞭解文化價值評斷與社會認同政治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階級、性別、種族、性等問題。這並不表示品味就是社會背景的產物(這是文化實證社會學可能會採納的取徑)。文化研究則探討迎合文化權力的各種美學價值系統。誰的意見被某個文化所採納；誰的意見被邊緣化？哪種(或誰的)愉悅形式受到認可；哪種/誰的愉悅又被認為是平凡、陳腐、甚至是危險的？這些都屬於論述的議題，跟社會中意義與文本的流通形式有關。此取徑亦關切主體性與認同的問題，以及我們生而為人的非理性及無意識過程。而前述各種研究文化產業的取徑都輕忽這些問題，但文化研究學者卻進一步鑽研，並指出社會中相對弱勢族群所消費的文化，通常容易被大眾遺忘甚而遭到鄙棄。女性主義對此有相當重要的論述，如肥皂劇(Geraghty, 1991)及女性雜誌(Hermes, 1995)等研究。

本主題的最後重點是，有些重要的文化研究致力於進行實證研究，剖析電視閱聽人與電視之間的互動型態。事實上，雖然在一九八〇年代及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這方面的評論大量湧現，研究卻為數不多〔最常討論到的是洪宜安(Ang, 1985)及摩利(Morley, 1986)的研究〕。此脈絡的研究有少數在近年竄起〔例如葛萊斯比(Gillespie, 1995)與曼凱卡(Mankekar, 1990)〕。有趨勢顯示，文化研究逐漸被文化認同問題及文化概念的理論論述所取代。雖然許多文化研究的論述極有價值，但諷刺的是，此取徑在有關接收與消費的實證研究方面仍嫌不足。

## 玖、超越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 及其他

根據上述討論及其他論述可知，文化研究對我們理解文化

及權力上的貢獻良多。因為他們偏向質疑現存的權力關係，你可能會預期，那些深信社會正義並無問題也無需改變的保守主義者會大肆抨擊文化研究。但文化研究其實也遭到自由基進派盟友的攻訐。許多最嚴厲的批判，泰半來自同為左派的政治經濟學者與基進媒介社會學者。他們通常指控文化研究與保守主義彼此秘密共謀(Gitlin, 1998; Miller and Philo, 2000; and others)。但文化研究依然故我，而這些政治左派份子當然也持續他們的猛烈攻擊。

或許因為這些基進份子對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各有不同解釋，因此，媒介與大眾文化的研究領域便分崩離析成兩個陣營：其一是政治經濟學，另一則是文化研究。不但各方書籍和文章不斷重申這個概念，還有數不清的研討及會議等場合，都指出「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有如 X、Y 軸線般地背道而馳」。即使有些學者宣稱他們希望能泯除彼此的紛爭，但他們很快便開始攻訐另外一方陣營有多麼諷刺可笑，並強烈地認同自己的觀點，使得這個迷思始終屹立不墜(例如 Grossberg, 1995)。

然而，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都無法精準有效地闡述媒介及大眾文化的取徑。這把本章前述各種研究取徑的爭議全貌，簡化成對立的兩端。但是，這其實不是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對立的問題，似乎這個領域的論述分界恰好在二者中間。此領域的真貌也並非如兩方陣營學者各自憑空想像的型態。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瞭解文化所有取徑之間的緊張關係。就目前的研究脈絡來看，關鍵應該是綜合各種現存取徑的最佳看法，鞭辟入裡地闡述文化產業的變遷與延續。在本節當中，我概述了我對各相關取徑重要爭議的觀點。

## 一、產製與消費

政治經濟學通常會以較為簡短的「產製研究」來代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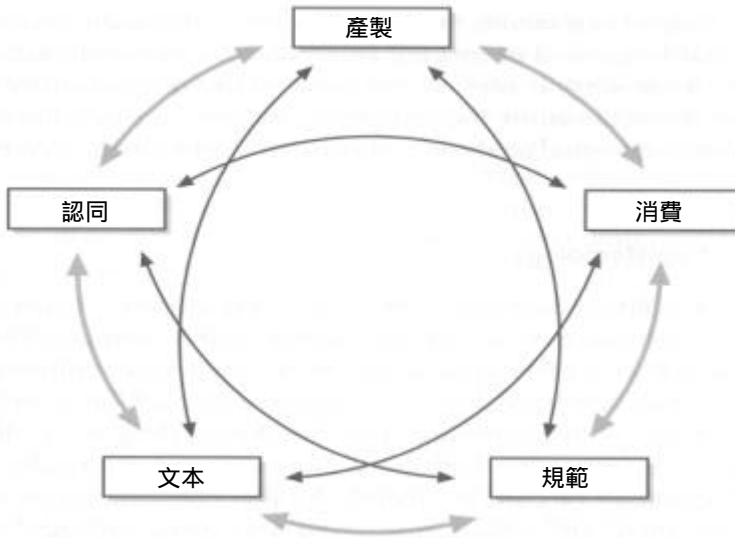
忽視主流文化經濟學、媒介社會學及文化實證社會學等，對產製所採取的態度其實有極大的差別。政治經濟學取徑尚且輕視消費面向的重要性。同樣地，文化研究亦常遭到嘲弄，認為它所涵蓋的幾乎都是閱聽人的實證資料，但事實上，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才更常發生這種狀況。

根據我在緒論中所指出的事實，我在本書之所以選擇把焦點放在文化產業上，就表示我主要希望闡述能釐清文化產製及規範/政策動態的研究取徑：也就是政治經濟學取徑、文化經濟學的某些論述、基進媒介社會學及文化實證社會學。產製及規範僅是「文化迴圈」中的兩個面向而已(參見圖 1.1)。

感到抱歉的是，因為受限於時間與精力，所以我不可避免地只能從文化迴圈中，挑出產製及規範兩面向來說明。但即使僅強調迴圈中的某些特點，我們仍須思考它們與消費、認同及文本其他面向之間的關係。如上文所述，文化研究與其他取徑比起來，對文本意義及文化價值的貢獻較多，但要完全整合產業、組織與文本的分析，確實仍有相當的難度。

## 二、文本、資訊及娛樂

其他取徑的支持者，有時會控訴文化研究過於關切文本意義的問題。不過事實上，文化研究雖然針對意義、認同與社會權力間的關係，提供許多理論建樹，但卻未對文本詮釋及評估的問題多加著墨。反而是其他與文本密切相關的取徑，才是發展文本分析的要角，例如批判論述分析(Fairclough, 1995)、美學理論(Carroll, 1998; Frith, 1996)、社會符號學(Van Leeuwen, 1999)、批判性音樂學(Walser, 1993)、更不用說是精闢的批判理論(Reynolds and Press, 1995)了。這些研究並不像一些傳統人文學科，試圖揭露藝術家灌注於作品中的複雜意涵，它們是在找尋文化文本中非刻意造成的複雜性。



本圖摘自英國空中大學「文化、媒介與認同」(*Culture, Media and Identity*)系列叢書，闡釋了文化各面向的相互連結性。理想的分析應要包含所有不同情境的說明，但實際上卻不可能，即使僅限定幾個現象來解釋也非易事。此迴圈概念是借用強森(Richard Johnson, 1986/7)的論述而來，而強森則是採納馬克思有關產製消費之間連結的觀點。

圖 1.1：文化迴圈(du Gay *et al.*, 1997)

政治經濟學、基進媒介社會學及自由多元主義的傳播研究，不約而同地都比較重視新聞與時事的資訊性文本，亦關切文化產業提供公民抵制不正義及權力濫用的資訊性資源之程度。但這些取徑對資訊內容的強調，卻遠勝於對資訊形式的關注，除此之外，相較於美學、情緒與情感，它們傾向給予理性認知的思考模式較高的評價〔參見麥克吉根(McGuigan)於一九九八年的類似論述〕。總而言之，這些取徑所受到的批評，大致上是其僅將娛樂活動等同於消遣，認為大眾傳播的主要目標即是逸樂：重點應該放在關注、理性、參與的公民之行動主義。若能採用文本分析及文化研究的研究形式，就可以解決這個偏差問題。

### 三、知識論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對立的迷思，就是過度強調彼此間的衝突，也忽視二者與其他取徑間的共同差異。跟文化實證社會學及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等較具實證取向的研究相比，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對文化權力的理論認知，其實還頗為近似。不過無庸置疑地，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在理論及知識論層面上，確實存在著劍拔弩張的關係。簡略來說，政治經濟學者在知識論層面上傾向唯實論(realism)，它「假設物質的世界，其實是外於我們對特殊情境的個人認知過程」(Garnham, 1900: 3)。這種觀點認為：人們可以獲得獨立真實的客觀知識。文化研究學者則採取更具建構主義及主觀主義的知識論取向，在某些情況中，研究者若能發覺被觀察者所受到的影響，確實可以得到較客觀的看法〔參見柯兒迪(Couldry, 2000b; 12-14)的女性主義知識論研究〕；但其他取徑則對所謂的真實秉持著基進的懷疑態度。尤其是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取徑，更常見到這類觀點。然而同樣地，這也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學及文化研究的對立問題。文化研究中的基進建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取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反感，甚至不認同本章前述提及的所有文化產業研究取徑。傳播研究及文化社會學的實證主義，與「批判－實在論」(critical-realist)立場的政治經濟學及後現代文化研究，彼此之間確實存在著鴻溝。

### 四、政治

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歧，可歸咎於錯誤的政治二分法使然。文化研究由一九七〇年代初以來的政治行動主義及思想上得到許多啟發，並將焦點放在性別、種族及性向等社會認

- 45 同議題上，而不著重經濟與資源重新分配的面向。H 對某些人而言，文化研究之所以重視社會認同問題，是為了建立聯盟，才能抵禦率先引起壓迫的政治經濟勢力。這就是為何上述某些政治經濟學者，認為文化研究隱含保守主義傾向，他們指責文化研究誤解了權力(例如 Garnham, 1990)。但這不僅只是政治經濟學者的想法。基進媒介社會學學者(例如 Gitlin, 1998; Miller and Philo, 2000)也常常提出這樣的觀點。相信許多傳播研究者及文化實證社會學家亦會同意此說法。不過在此再一次重申，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對立的概念是全盤錯誤的。

這些對文化研究的回應，反映出一些重要議題。他們創立一種政治態度，使人們在面對自我認同團體受到壓迫及不公平待遇的困境時，會放棄團結禦外的想法及對他人的同情心。但基進評論者對此卻無動於衷，也很少給予正面意見，依然偏執地嚴詞批評，他們並未運用新方式來思考並與政治文化對話，以提出攻擊新保守主義的論點，而他們所奚落的對象，則是那些整合弱勢族群，但卻只關切左派機構所認可之特定邊緣族群的那些學者。

這些在文化產業脈絡中的重要問題，都是源於文化產業身兼產製系統及文本產製者的雙元角色之故。假使我們想要批判文化產業產製的文化型態、或其產製方式，那麼就須瞭解以下兩大面向：其一，是政治經濟學所強調的重新分配政治問題；其次，則是把焦點放在文化認同上的認知政治(Fraser, 1997)。

## 五、決定論及化約論的問題

文化研究、傳播研究及文化實證社會學，常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有化約論(reductionism)之嫌，因為他們會逕自整理錯綜複雜的文化事件及過程(例如好萊塢電影工業、電視肥皂劇

---

H 霍爾(Hall, 1992)曾指出，文化研究被左派份子用來反對某些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那些受史達林主義影響的人士。

的本質，或電視身為一傳播媒介的發展），歸因成單一的政治經濟因素（例如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掌控產製工具的社會階級、或產製工具所有權階級用來獲利的基本條件）。這確實都有化約論的傾向，不能真正瞭解隱含在文化中的交互作用因素。事實上，有些具有化約傾向的政治經濟學論述，對它本身的分析並未加以評判。在此須特別注意的是，決定論（determination）並不重視可能會造成必然後果的外部力量，而是會以非化約的觀點，來看待設定限制及施加壓力的狀況〔威廉斯對此區別有很詳盡的闡釋（Williams, 1997: 83-9）〕。一個妥善的分析會把經濟決定論的過程分離出來，不會把其他過程、文化壓力、及其互動的方式混為一談。其餘探討文化事件現象或過程的要素尚且包括：法律及政治領域的制度角色；特定時間中的論述、語言及再現；不同團體中人們的信念、幻想、價值與欲望等特徵。當然，並不是所有論述都能瞭解各種時機下的權力混合變遷情況。哪個要素被強調，皆會被「我們的主觀意圖、身為閱聽人自認瞭解的知識、我們用來吸引讀者注意的歷史謎團新線索鑑定」（Rigby, 1998: xiii）所影響。然而，這種折衷觀點並不表示就得放棄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優先考量。例如，里比（Rigby）所謂的「主觀意圖」，指的應該就是試圖造成社會變遷的某種力量。多元論的觀點也不認為採行相對道德及自由多元政治，就能影響現存的民主體系運作。

本章已投入許多篇幅試圖說明這些難以表達的抽象用語；我們應該迴避馬克思的曲折論述，不再探討他究竟誤解了什麼。而應取而代之地思考各種情境下必然的複雜交互作用，以便瞭

---

1: 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為化約論，這是一個極難解決的辯論議題，在此先不耗費篇幅討論。里比（Rigby, 1998）曾提出一個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必然是化約論，但當它避免落入化約論的桎梏時，結果卻會成為多元論，而極易與多元主義社會學混淆。

解社會變遷的難易程度，以及哪種環境可能造成這些變遷。J  
假使經濟決定論與化約論的爭議，確實造成政治經濟學與其他取  
徑之間的緊張關係，那麼透過折衷的方法論，伴以承認權力結構  
47 及不公平正義的基進社會民主觀點，各取徑或許會有匯流的可能  
性。若能多加提倡實用主義的取向，不但能涵蓋強烈的經濟因素  
決定論，還可擴及上述各個需要著重的因素。這些都將是第三章  
的主要內容，我們會繼續探討文化產業的延續與變遷。

本章與緒論所論述的議題相同，依據本書中心主旨，針對  
文化產業相關研究取徑的主要成就及限制加以闡釋。關於媒介  
及大眾文化研究領域分裂為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取徑的概念，  
我亦在本章中試圖澄清。我的整體策略或許可以描述為：某  
種特定形式的政治經濟學取徑，而此研究取徑則是受到文化實  
證社會學、傳播研究及文化研究某些觀點的啟發。至於這個  
整體取徑該如何建立評估解釋文化產業變遷及延續的架構，那  
就是後續兩章的主題了。

## 延伸閱讀

因為本章已經對多數的文化產業相關文獻加以剖析，在此我將  
概述一些延伸概念的書籍。

---

J 儘管近來已鮮少談論經濟因素的決定論，許多著名的新馬克思  
文化研究學者仍不斷地強調多重因素的決定論(泛決定論)(Grossberg,  
1995)。但在許多文化研究文獻中，確實很難找到有關政治經濟要素  
的詳盡論述，例如「資本主義」一詞。



### ■媒介、傳播及大眾文化領域的整體概述

柯倫(如 Curran, 1996; 2000)的著述中有許多重要章節，皆有系統地整理了政治經濟學、傳播研究和文化社會學取徑，但須注意的是，某些文化研究的概念亦參雜其中。馬奎爾(McQuail, 2000)以自由多元主義傳播研究的觀點，領導大眾傳播領域的研究。馬特拉夫婦(Mattelart and Mattelart, 1998)的《傳播理論》(*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則對英美的本位主義(parochialism)多所批評。許勒－麥克柴士尼(Schiller-McChesnet)的傳統論述則著重於公眾的積極行動，而對理論則興趣缺缺；丹·許勒(Dan Schiller, 1997)的《傳播的理論化》(*Theorizing Communication*)則以一種獨特且新穎的方式，詳述了傳播研究的發展歷史。就我的觀點而言，最適宜的教科書是克羅提與霍伊尼斯(Croteau and Hoynes, 1997)的著作。 48

### ■特定途徑的概述

想要綜覽政治經濟學取徑，絕不能錯過莫斯可的大作《傳播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1995)，雖然此書對學術系列歷史的追溯略嫌冗長，但仍不減它探討主流的、正統的經濟學限制之優點，另外，葛爾漢(Garnham, 2000)之作亦有此長處。高定(Peter Golding)與莫達克(Graham Murdock)曾出版一系列針對媒介和文化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取徑之著作，其首作發表於一九七四年(Murdock and Golding, 1974)，一九七七年又出版綜述變遷中傳播領域的書籍(Murdock and Golding, 1977)，該書更在一九九一年重編新版，一九九六年及二〇〇〇年又兩度修訂(參見 Golding and Murdock, 2000)。政治經濟學取徑近五年來的變遷皆涵括其中。至於文化研究取徑，我認為柯兒迪(Nick Couldry, 2000b)的《透視文化》(*Inside Culture*)涵蓋了國際面向的思考，實為此領域的首選。至於編著方面的論作，我認為杜林(During, 1993)最為突出。摩利及陳光興(Morley and Chen, 1996)所編纂之霍爾的著作亦頗為著稱，並在文中加入許多文化研究重要學者的有趣評論。